



ULSZ3094 Project II

王安忆《长恨歌》都市生活下的女性悲剧
Female Tragedy in City Life in Wang An Yi's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张靖萍

CARYNE TIONG JING PING

20ALB05938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3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	4
第四节 文献综述.....	5
第二章 《长恨歌》所展现的上海都市文化.....	8
第一节 上海的历史变迁.....	8
第二节 上海的文化融合和社会变革.....	10
第三章 《长恨歌》中都市女性的生存法则.....	13
第一节 在物欲与男权中心随波逐流.....	13
第二节 孤寂勇者：都市女性的独立奋斗之路.....	16
第四章 《长恨歌》中都市女人悲催的命运.....	18
第一节 找不到自己——成为欲望与权利的傀儡.....	18
第二节 女性的无奈与不幸.....	20
第五章 结语.....	23
参考文献.....	25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资料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细列明有关参考书目。



姓名：张靖萍 CARYNE TIONG JING PING

学号：20ALB05938

日期：2023 年 12 月 1 日

论文题目：王安忆《长恨歌》都市生活下的女性悲剧

学生姓名：张靖萍

指导老师：黄丽丽师/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长恨歌》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女作家王安忆的作品，此长篇小说于 1995 年发布在《钟山》杂志，并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通过描绘上海这座大都市生活下的女性形象，深刻反映了她们在当代社会中所面临的悲剧。本论文以文本分析和社会学角度为方法，聚焦于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旨在探讨她们在都市环境下所遭受的困境，以及这些困境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在繁华的城市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受到了诸多限制，她们在事业、家庭和情感上都经历了一系列曲折。《长恨歌》深刻揭示了都市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不易，她们在职场、家庭和情感上所经历的一切反映了社会变革中女性地位的复杂性和艰辛。这部小说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女性的权益，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和包容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王安忆；《长恨歌》；上海；都市；女性悲剧

致谢

此前，我曾阅无数致谢感言，也曾想过自己应该会写些什么，但真正执笔时，却迟迟无从下手，因我知道这一笔意义非凡，意味深长。坐在电脑前，回想大学三年，许多画面一闪而过，有欢笑，也有泪水，每一个情绪都是难忘的。在此，我想向所有的相遇与经历致谢，是你们成就了现在的我。

同时，我想向论文指导老师——黄丽丽老师献上万分感谢。从一开始论文定题到内容反复修改，您都悉心给予我意见及方向，您对学术的专业态度，是我该学习的榜样。在您的协助与指导下，我获益良多，并得以顺利完成此论文。学生在此祝福老师未来一切顺利！

此外，我也十分感谢我的父母。在本人撰写论文的这段时间里，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让我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撰写论文。谢谢你们，总是给我最好的。未来的我将继续努力，不负此恩。

接着，我想感谢陪伴我走完大学三年的伙伴们——彩莹、佩丽、陈靖、展学以及蕙仙。他们不仅陪伴我走过大学三年，同时在这段时间里给予本人适当的监督与鼓励。我知道此去一别，天南地北，但我不会忘记那无数个谈心的夜晚，更不会忘记曾与我并肩作战的你们。祝福你们，前程似锦！

最后，我想感谢自己。这三年不容易，却也一步步坚持地走完了这个短暂的旅程。未来的道路，或崎岖难行或处处惊喜，愿我都勇敢前行！

王安忆《长恨歌》都市生活下的女性悲剧
Female Tragedy in City Life in Wang An Yi's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第一章 绪论

现代化大都市的兴起虽为女性带来了改变原本生活的契机，但她们同时也是被社会压抑的对象。社会都市化意味着物质文明的建立、科技的发达以及公共空间的发展，而这些先进的文化与思想逐渐影响着城市女性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成为了乡村女性所向往的生活环境。社会的发展确实让女性的生活得到了实质的改变，但是当她们挤进以男权为中心的空间时，她们仍然会面临重重的困难与不公。都市女性的遭遇为女性作家创造了全新的叙述背景，开始从乡村写进了城市，为女性的境遇发声。她们不断挖掘女性身处在大都市中的心理与精神变化，并融合自身对城市背景与历史的认识，叙述女性在都市生活下的困境。由此，笔者认为人们可以透过文学看到一个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境况。这就如同矛盾所说：“真的文学是可以反映时代的文学。”¹因此，本文将透过研究现当代文学作品来探讨女性在都市生活下的困境与悲惨命运。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刘士林曾在〈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里提到国际都市化会对人类的精神及文化消费有一定的影响。²简言之，大都市是商埠、经济、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心，人类身处在这样的环境下，精神与心理会潜移默化的被其影响，成为都市的经济傀儡。洪建妮指出，在1843年，上海被开发为商埠后，便将经济视为城市中心，使得上海人对物质与消费理念有了实质的改变，他们开始以功利为先，尤其是在社会上属于基层的女性，为了享有更好的物质生活而不折手段。³在此背景下，有不少的作家以城

¹ 王先霏、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页 67。

² 刘士林，〈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学术研究》2007 年第 10 期，页 121。

³ 洪建妮，《论王安忆〈长恨歌〉的都市书写》（青岛：青岛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

市与女性为叙述题材，将城市的历史与人交融叙述，张爱玲与王安忆便是这类的作家。王先霈、胡亚敏在《文学批评导论》里提到：“文学作品不是凭空创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⁴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作家所处在的一个社会背景、文化教养会影响文学的产生以及其发展走向。

王安忆，在 1954 年出生于南京，是一名上海人。⁵1955 年，王安忆随着母亲迁移至上海，从此在上海生活与成长。⁶对于王安忆来说，上海是一座拒绝外来者的城市，它有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使得她奋力地寻找自身在这座城市里的价值与身份认同。⁷在追寻认同的历程中，上海的精神与文化逐渐充满着她的血液，进而化为一股叙述及批判书写的力量。城市与女性一直都是王安忆的创作题材，王安忆将她在上海这座都市所看到的、经历的，放在每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身上，放映出上海女性的悲惨命运。无论是在《米尼》中的迷尼或是《香港的情和爱》中的逢佳，还是《长恨歌》里的王琦瑶，⁸她们都是由上海文化所孕育的产物，是务实的、是有目的、是世俗的，而她们的结局也都是是一样的，皆是一场悲剧。但虽如此，王安忆的女性悲剧叙述是带有一定突破性的，她笔下女性的命运虽坎坷，但却试图摆脱了历史文化上女性“娇弱”的女性形象，建立一个又一个坚强自主的全新女性面貌，而本论文所要研究的文本《长恨歌》中的女主人公王琦瑶便是如此。

《长恨歌》是王安忆在 1995 年连载于〈钟山〉的一部作品，曾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⁹《长恨歌》呈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展示出一座城市的故事与一个女人的悲剧人生。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叙述了女主人公——王琦瑶四十年的悲惨命运，而这命运的背后所反映的其实是一座城市时代与文化的变迁。作者将上海与女人交织相融，就如同她曾说：“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

2014)，页 16。

⁴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页 69。

⁵ 〈王安忆生平年表〉，《中国作家网》2016 年 7 月 4 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fwzj/writer/56.shtml>

⁶ 黄淑祺，《王安忆的小说及其叙事美学》，（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5），页 1。

⁷ 黄淑祺，《王安忆的小说及其叙事美学》，页 1。

⁸ 沈红芳，《女性叙事的共性与个性——王安忆、铁凝小说创作比较谈》（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页 186-189。

⁹ 《中国作家网》，〈王安忆生平年表〉。

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¹⁰ 然而，这座城市的历史演变对身为社会基层的女性的生活来说，有着更深刻的影响，笔者认为这就是王安忆想要将女性放在故事主轴的原因。因此，《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并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她代表的不是自身的命运，而是上海女性们在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里被都市文化教化的坎坷人生。在这四十年里，上海这座城市经历了战争、文革、改革开放，而上海女性们的人生也随着历史的演变起起落落，她们便是王琦瑶。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王安忆作为大陆新时期文学¹¹的优秀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固然受到当代评论家的关注以及读者们的喜爱。因此，有不少的学者对王安忆及其作品进行了研究。例如，王德威曾为读者介绍王安忆本人与其作品、台北不少出版社出版了王安忆的多部作品，也深受台湾读者们的喜爱。笔者对王安忆的《长恨歌》最为感兴趣，尤其是里头的城市书写与女性书写的交叉呈现，让笔者叹为观止。此外，《长恨歌》中呈现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作品里的女主人公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命运，深刻的呈现了都市文化下对基层女性的生活是有一定影响的。女性在《长恨歌》中的女主人公靠着自身的毅力，只为了挤进被物化的都市，过着从容安逸的生活。但残酷的社会，让她最终成为繁华城市中的牺牲品。由此可见，女性在由男权所主导的社会中是充满挑战的。

在现今社会不断发展的趋势下，都市女性的境遇是值得被关注的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女性在社会上的处境虽有了极其大的变化，但男权文化已根深蒂固，尤其是如今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仍带有一定的争议。现今社会仍有人认为在职场上男性肯定比女性优秀、在婚姻里丈夫应处于主导地位、婚后的女性应相夫教子等等。这些“男尊女卑”的社会思想忽略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存在价值，让女性被社会边缘化，从而导

¹⁰ 李海燕，〈城市与女人——王安忆都市书写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4 卷第一期，页 81。

¹¹ 黄淑祺，《王安忆的小说及其叙事美学》，页 1。新时期文学指的是 1976 年以后，中国文学家的创作活动以及人们对“文革”后正在展开的文学的命名。

致她们坎坷的人生命运。因此，本文希望能透过研究与剖析当代文学作品——王安忆《长恨歌》里的都市与女性叙述，以理解与印证都市生活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并反思历史文化遗留给女性的社会定位。

本论文将以以下几个方面作为研究中心：

第一、透过研究现当代文学作品，来理解女性在都市生活中的境遇。

第二、探讨《长恨歌》中女主角的经历与其悲剧命运叙述。

第三、分析《长恨歌》中的女主角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生活变化，以及在其中所表现出的为生意识，以便能更好的呈现女性在都市生活中的艰辛。

第四、分析都市生活下女性的悲剧，以社会学的理论探讨都市文化会对女性造成的影响。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将着重使用以下几项研究方法：

一、文本细读法，笔者将对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及王安忆创作的其他有关城市与女性书写的作品进行研读。笔者会着重分析作者的叙事手法以及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刻画及其文本结构，来探讨王安忆笔下的都市环境、王琦瑶的女性形象、生活转变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从中挖掘写作意图和批判目的与意义。在此过程中，笔者会记录文本中的重要信息，再将其内容作者的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等进行有效结合，以便能更好的了解作品产生的过程及其深层含义。

二、文学批评法，笔者将着重使用文学批评法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性别批评、心理学批评对王安忆的《长恨歌》进行深入的研究。社会历史批评是主要研究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及其文学的社会作用（王先霏、胡亚敏，2005：63）。

此外，笔者也会透过性别批评法来看社会与文化所孕育出的男女差异，以便能更好的理解社会文化的建构对男女的思想、行为、心理有着一定的影响。本论文将借助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中的理论，来探索两性文明，并论证女性所身处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外在行为及内在心理有着致命的影响。女性长期处在男权制度下，会形成一种自我否定的潜在意识，成为男性的附属品。

第四节 文献综述

王安忆的《长恨歌》有着复杂且深入的叙述结构，所以它赋予了研究者们有很多的阐释空间。许多学者以不同的视角和论点对《长恨歌》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建立了不同的研究领域，有城市、女性及物质研究。因此，笔者将在本章节梳理和分析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并以现有的资料为基础来更深层地分析都市生活下的女性悲剧。以下将以在搜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许多的学者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视角对《长恨歌》中女性悲剧命运展开研究：

钱智民（2009）在其论文〈风华绝代终难免百年长恨——王安忆《长恨歌》的悲剧情意蕴〉中指出都市女性之所以会有悲剧的命运是源自于她们个人的选择。作者在论文中以多个层面来分析《长恨歌》中的女人公王琦瑶的悲惨命运的原由，那就是个人生活、社会化境以及亲友圈子，是一种人性的显现。作者认为王琦瑶的命运是她个人对欲望的追求所带来的结果，她为了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而选择依赖男性、选择承认男权社会、选择以利益而交友，这些种种的个人选择，促使她最终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此外，作者还提到王琦瑶或上海的女人们长期受到男权社会与文化的影响，以至于她们接受了社会的不平等，所以她们认为只有选择依附男生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¹²

杨明月与郑瀚（2020）在〈秋色玉目皆婉转，只待人间齐眉歌——浅析王安忆《长恨歌》中女性的悲剧命运的原因〉则是以女性意识为切入视角来探讨都市女性的悲剧命运。他们在论文中讨论到王琦瑶是女性解放的代表，她以坚强的女性形象在男权社会中无所畏惧，跌倒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作者认为她是超脱传统的女性形象，她不是懦弱的，她不但没有被生活的种种困难打败，而是在每一次的“隐忍”中痊愈，

¹² 钱智民，〈风华绝代终难免百年长恨——王安忆《长恨歌》的悲剧情意蕴〉，《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五期，页11-14。

重新投入男人的怀抱中。作者认为是王琦瑶的女性意识与人性的推动，让她走向了坎坷的人生道路。¹³

王春翔（2009）在〈浅析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的悲剧根源〉指出任何的悲剧都与社会根源有密切的关系。作者在研究中更是强调女性是时代的牺牲品，她们在男权社会下无疑是受害者，而《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便是受害者。作者更指出男权文化的根深蒂固使得作者已潜移默化的带入男权的思想，以至于将男权意识隐藏在《长恨歌》这部作品当中。王琦瑶虽是坚强的女性，但她一生却将自己的命运与男人绑在一起，即依附男人就能得到幸福。作者在文中一直强调“男权”这一词汇，他认为都市女性的命运与男权文化脱不了关系。¹⁴刘福珍和蔡勤在〈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悲剧成因〉中指出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女性掉进了悲剧的深渊里。作者提出上海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城市，他们主宰着城市及女人的命运，他们是社会的掌权者。男性只是将女人看为是“玩物”，以至于女人注定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¹⁵

除此之外，学者李湘云指出王安忆在描绘上海时，与张爱玲不同，她选择以人物为突破口，通过刻意塑造个体来展现上海的变迁。她在叙述上海这座城市时，注重描绘城市中琐碎平凡和微妙细致的日常生活。当她重新回到上海时，这个城市对她而言显得模糊而陌生。她自己对于上海来说就是一个异乡人，而她感受到的对上海的陌生感和疏离感让她将自己看作是上海的观察者和寻找者，从而在城市文学作品中形成了独特的叙述角度。《长恨歌》正是王安忆通过王琦瑶这一女性形象完成了对上海的新发现。她通过塑造这一人物，深刻地书写了上海的故事。¹⁶

¹³ 杨明月、郑瀚，〈秋色玉目皆婉转，只待人间齐眉歌——浅析王安忆《长恨歌》中女性的悲剧命运的原因〉，《名作欣赏》2020年第十八期，页93-94。

¹⁴ 王春翔，〈浅析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的悲剧根源〉，《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12期，页14-15。

¹⁵ 刘福珍、蔡勤，〈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悲剧成因〉，《安徽文学(下半月)》2007年第1期，页14-15。

¹⁶ 李湘云〈都市叙述空间与人物生存的书写——张爱玲《倾城之恋》和王安忆《长恨歌》比较〉，《文学评论》2023年第9期，页106。

综上所述，许多学者在研究王安忆的《长恨歌》中也发现了社会文化对女性的生活命运有着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女性活在历史文化的定位里。此外，作者本身的经历与发现对作品所呈现出的女性命运也带有影响。笔者发现学者们的研究结果都离不开男权社会以及人性的丑恶，但男权社会与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有关系，而人性却与成长环境与心理成长有一定的关联。因此，本文将以现有的研究结果为基础，并融合社会学及心理学理论再进行研究。其次，探究大众对男权社会的纵容和人性的丑恶的成因，并融合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例子，论证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以及女性个人的不健康心理对女性的生活境遇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二章 《长恨歌》所展现的上海都市文化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通过其生动的叙述，让读者有机会深入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时代风貌。这本小说以王安忆虚构的王琦瑶的故事为背景来呈现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勾勒出了上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繁荣与衰败，展现了上海都市文化的多重层面。在小说中，王安忆借着王琦瑶这个小市民的代表与其生命的转捩点来凸显上海都市历史的转化，每一个年份仿佛都精心设计，即王琦瑶就是上海，上海就是王琦瑶。

第一节 上海的历史变迁

上海，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已经在近百年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长恨歌》中所描述的时代背景跨越了 20 世纪初的民国时期到 20 世纪末的改革开放时期，反映了上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和风貌。王安忆笔下的《长恨歌》虽跨越了中国历史上最重大而深刻的 40 年变革时期，但却避开了所有历史的痕迹，没有战争，只有小市民女儿的日常点滴。她用一个小女人——王琦瑶的一生来叙述上海的命运，呈现了别具特色的上海的历史进程。

在小说中，王安忆细腻地描绘了 1946 年代的上海，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文化交流的时代。《长恨歌》中表现出的上海时代风貌首先聚点在旧时代的繁荣，不是灯红酒绿的街道，只有老式的小巷——弄堂。作者在小说的一开始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叙述弄堂和里头的的生活情景，让读者们站在一个至高点俯瞰上海被掩盖的旧文化，感受其中的温情与感动，以及小市民的朴实生活。从历史层面来看，当时的中国抗日成功，未进入到内战时期，而当时上海的滩头堡吸引了国内外商人、艺术家和文化名流，成为文化交汇的中心。小说中的各个角色在这个繁忙的城市里追逐他们的梦想，同时也经历了爱情和友情的波折。这一时期的上海被描绘为一个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城市，吸引了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王安忆在小说中描写了当时上海的情景：“一个先生两个小姐是

一九四六年最通常的恋爱团体……”，¹⁷体现了上海当时的闲情意境以及权利与欲望的社会意识。

此后，王琦瑶在 1948 年住进了爱丽丝公寓，沉浸在温柔乡的愉悦中，在这座公寓外的却是内战的紧急局势。1948 年这个年份，正是新中国建立的前一年。故事一转，时间来到了 1957 年，王琦瑶的生活跌入谷底，李主任遇难，她搬出爱丽丝公寓，搬到了外婆居住的小镇里，过一阵又回到了上海并结识了康明逊。当时，正是中国开展“大跃进”运动的前一年。接下来，1965 年故事进入王琦瑶经历了好友蒋丽莉的病逝。这个年份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前一年。¹⁸1985 年，王安忆的人生随着长脚的强盗行为下画上句点，当时正是中国准备改革开放的时期。

中国的历史经历了战乱、动荡和政治改革，这些事件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上海，同时也让居住在上海这座都市的市民生活随之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也经历了动荡，许多文化人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这一时期的上海呈现出沉寂和压抑的氛围，与旧时代的繁荣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再次开发浦东，上海焕发出新的生机。小说中的角色们参与了城市的建设和改革，上海成为了一个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现代上海展现出了高楼大厦、国际化的风貌，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上海的时代风貌在小说中呈现出了巨大的变革，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王安忆塑造的王琦瑶角色的生命转折点连接于都市命运的大起大落，展示了上海的时代风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及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总之，王安忆的《长恨歌》通过其生动的叙述，深刻地描绘了上海的时代风貌。虽然作者在《长恨歌》中叙事的年份都有其历史意义，但她却避而叙之，只把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放入这些年份的叙事中心，仿佛要告诉读者在市民的记忆中这些时间点只是小市民生活的繁琐。王安忆曾说过历史是由生活点滴所组成的，不仅由重大事件构

¹⁷ 赵欣，《上海都市文化与上海女作家写作》（上海：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页 122。

¹⁸ 《上海都市文化与上海女作家写作》，页 122-123。

成的。¹⁹此外，笔者认为历史的进程在小人物身上的影响尤为明显，因他们是被历史浪潮冲盖的边缘群体，不为人知的细缝里往往藏着最多的秘密。这本小说透过小市民的生活日常展示了上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繁荣与腐败，以及上海都市文化的多重层面。从旧时代的繁荣到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再到改革开放的新兴时代，上海的时代风貌在小说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了这个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与此同时，历史的变迁逐渐影响社会的变革，让人性逐渐开发，人们的眼光与追求产生变化。

第二节 上海的文化融合和社会变革

在许多人看来，上海是繁华与奢侈的代名词，但王安忆舍弃以政治与经济层面来审视上海这座城市，却以小市民为小说的人物中心来解读上海。这让读者对上海这座城市有全方位的认识，能以宏观的视角俯视上海。同时，作者透过市民的生活的变化，不仅透露了上海的历史变迁，同时展现了上海社会文化的发展。

三十年代的上海，外国的政治与经济力量入侵上海，使上海成为半殖民地。与此同时，上海与国际文化接轨，使上海引进了许多新的文化与生活模式，以至于出现了令人怀念的“十里洋外”的全新生活面貌。这种生活对于王琦瑶来说，是带有期待的想象，所以她对这种时尚的生活模式有追求也是无可厚非的。当然，王琦瑶就是上海小市民的代表，王琦瑶的向往便是小市民们的向往。因此，当机会降临在王琦瑶身上时，她不会轻易放开，她摇身一变，成为上海的前卫者。她从平安里搬到爱丽丝公寓，成为了权贵外室，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王琦瑶的辉煌时期反映当时上海的繁荣，同时也带出都市文化的变迁对市民的追求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当她们看到机会时，就会以激进的姿态反抗社会的不公，以此来泄愤。

《长恨歌》中“怀旧”热潮是贯穿整篇小说的主题之一。因此，许多人将王安忆定义为怀旧时尚作家，但她却否认于此。她认为《长恨歌》只是为怀旧提供了资料，

¹⁹ 许梦娇，〈《长恨歌》：一个女人和一座城〉，《大众文艺》2023年第三期，页23。

但该小说是真实的故事。即便如此，《长恨歌》仍带有怀旧的特色，因王安忆以整体都市文化的体验为基础，回顾了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感慨都市时尚的演变对市民生活的影响。《长恨歌》反映了王安忆对城市文化与社会变革的解读，带读者一同俯瞰城市的历史文化图景。

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历史随着王琦瑶生命的终结而画上了句点，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却难以迅速消逝。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或许会遗忘那个时代的细节，但那段历史所带来的影响将一直存续。王琦瑶本人以及与她相关的物件，如旗袍和金边花纹的碟子，成为了旧上海文化的象征，持续唤起人们对过去精致而独特文化方式的回忆。这是一场持久的梦，它让人们保持对旧时代的珍视和思考。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上海再次与国际文化对接，而当时人们十分想念殖民时期上海的繁华，小说中的角色老克腊这些青年人便是可称为怀旧的代表。然而，他们所谓的怀旧只是在父母的熏陶下，再加上自己的想象而得，并非真心地喜爱。老克腊可以说是在王安忆笔下从怀旧文化中觉醒的人，他对王琦瑶的欣赏也是如此。一开始，他见到王琦瑶时被她所吸引，正因为她把王琦瑶当作是“旧物”，将她与怀旧文化融合在一起。于是，当他们两人有了身体上的接触后，老克腊仿佛被现实当头一棒，身体上的温度让他逐渐清醒，最后头也不回的离开。²⁰

再加上，作者以叙述王琦瑶的经历反映了社会变革对女性所带来的影响，包括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义和职场机会的扩展。时代的变革让她不仅是一个典型的女性，还是一个在都市生活中积极寻求自己价值的个体。王琦瑶本是一位追求名利之人，但却受到社会的限制，她清楚知道命运是由自己掌控，机会抓住一点是一点。因此，她不惜一切代价要参与“上海小姐”，她透过自己努力进入复选，而这就成了她奢望的开端。当时，电影片场的导演劝导王琦瑶退选，认为她这个年纪应该专注于学业，而不该被金钱名利蒙蔽了双眼，以免被吞噬而后悔莫及。但她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尝试竞选“上海小姐”，最终获得第三名，成为“三小姐”。王琦瑶的坚持突破传统女性的形象，

²⁰ 许成颖，〈独特的女性都市文化体验〉，《宁德师专学报》2004年第三期，页5。

重新为女性在社会上设定一个位子，而不是逆来顺受的软弱脾性，这反映了社会变革对女性追求的影响，同时也是社会变革逐渐渗透女性生活的印证。

王安忆在小说中分为三个时间段，尝试解释上海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变化，从衍生到繁荣，直到毁灭此外。此外，王琦瑶作为《长恨歌》中的象征性角色，代表了文化融合和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她的情感生活中反映了中国都市社会的多面性和变革。通过王安忆虚构的故事，读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文化融合和社会变革如何影响女性不同层面的生活，包括情感关系、家庭、职场和社会地位。这一主题在小说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为读者提供了深刻的反思，关于都市生活中不断演变的文化和社会。《文学批评导引》中提到文学作品并非孤立的创造，也不是单纯个体行为，而是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孕育的产物。²¹因此，王琦瑶是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塑造，放映当时社会的变迁。

²¹ 王先霏、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第二版)》，页 68。

第三章 《长恨歌》中都市女性的生存法则

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中，作者提到妇女的社会地位之所以产生变化，是始于私有制的出现。私有制的实行使原本男女平等的劳动生产力开始失衡，女性对家庭家务的辛勤与男性谋取生计的劳动力相比，女性的付出显得微不足道。至此，母权开始让位，男性便处于社会的主权位子。²²在父权体制下，传统女性只能顺服于男人的种种决定。这也表明了这种文化对女性的限制和剥夺，使她们在追求爱情和权力时常常被迫做出牺牲。久而久之，男权文化的根深蒂固让想要崛起与争取自由的都市女性看成是一种救命稻草，她们的觉醒尚未完善的时代，虽摆脱了乡土与传统的约束，但却还是沉浸在男人与物质的世界里。

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中，每一笔下虽都有王琦瑶的身影，看似在写女人的一生，但文中不难感受到有男性霸权的味道。这或许与王安忆自身的感受有关，她曾说：“我觉得这个世界是男人的社会，男人的世界真的很大很大。”²³因此，王安忆笔下的女性是认清现实，且坚强地活着的，她们的泪水不是软弱，反而是坚强的一部分，这就是都市女性生存的方法。王琦瑶是融入都市物欲世界里的小女人，她懂得权衡利弊但注定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者，仿佛想在男人身上得到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有。

第一节 在物欲与男权中心随波逐流

小说中的李主任可以说是男权的标杆人物，当王琦瑶遇见李主任的时候，她知道她必须得抓住这个改变她命运的一根稻草。王琦瑶知道李主任的身份地位可以让在这物质空间下生存，所以她必须用尽心机得到李主任。对此，当李主任随口邀请她住进公寓时，她迫不及待地问李主任何时可以搬到房子里，她的态度让李主任感到十分

²² 【法】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页 58。

²³ 刘芳池、何丽敏，〈对男权社会的无奈认同——王安忆《长恨歌》中男性形象解读〉，《时代文学（上）》2010年第三期，页 118。

惊讶，他原以为王琦瑶会考虑他的提议，不料她却马上答应，李主任只能故作镇定地回应她随时。²⁴在传统社会中，女性总是扮演逆来顺受，温柔含蓄的角色，这是在男权体制下所赋予女性的定位。然而，王琦瑶激进的态度却突破了传统女性的含蓄，但这样的突破却仅建立在物欲的追求上。或许她是功利的，但这功利肯定夹杂着无可奈何，她知道这是男人的世界，唯有靠男人，她才过得上理想的生活。其实王琦瑶与李主任的关系很简单，只是一场交易，他们之间各取所需，为的都是满足自身的利益。尤其是在上海这座充满欲望的城市，刚到大世界的王琦瑶只能投靠权贵才能满足她的物欲。

王琦瑶只是李主任的外室之一，所以对他而言，他对王琦瑶只是一种被欲望驱使的责任。碰巧的是，王琦瑶正需要的就是这种责任，对她来说这就是安全感，而这份安全感仅停留在物质与虚荣上的满足。王琦瑶为了能够长久享受，以至于她不敢反抗李主任对她生活中的每一次安排，她极为顺服李主任的决定。此外，王琦瑶每一次都盼望李主任的来访，即便她的期望落空，她也不会李主任面前发脾气：“赌气这种小孩子家的事，怎么能拿来对李主任呢？”²⁵因此，她对李主任总是惟命是从，接受李主任对她人生的左右，只是深怕她梦想的生活被摧毁。在这段关系中，王琦瑶是坚强的，无论多委屈，她从不作无谓的反抗也不退缩，甘心成为这段关系里面的被动者，总是被牵着走，在金丝雀中徘徊于富贵与情绪折磨中，痛苦又享受着。这是女人在都市生活中无法逃避的过程。

如果说李主任是王琦瑶的安全感，那么康明逊就是王琦瑶心灵上的救命稻草。李主任遇难后，王琦瑶终究梦想破灭，她逃出上海，从金丝雀搬到郛桥小镇，脱离了物质的金丝圈。过了不久，她再一次回到了上海，这一次她不再执著于名利的追求，只想要回归内心的本质，感受上海这座城市的人事物。然而，她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令她动真情的男人——康明逊。她爱康明逊，但因她曾经是阔人外室，人生价值已贬值，令康明逊的家人无法接受她成为康家的媳妇。对此，康明逊表示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在家中始终没有说话的权利，只能顺服家中的安排。王琦瑶之所以爱康明逊，

²⁴ 王安忆，《长恨歌》（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页 107。

²⁵ 王安忆，《长恨歌》，页 107。

是因为他理解她的软弱，体贴她的心情，对她来说这种爱是一种奢侈，一种天降的礼物。因此，即便康明逊的懦弱无法给她一个承诺，她也不会闹脾气，因她的认知里已接受她的人生贬值的现实。在康明逊的身上，王琦瑶不敢奢求一份完整的爱，她委屈求全，只为了得到心灵上那份爱的慰藉。无论是李主任还是康明逊，她都是如此卑微地爱着，唯一不同的是：一份是物质上的爱，一份是心灵上的爱。

即便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王琦瑶依然活在男权之下。老克腊是王琦瑶生命中最后一个过客，他们的感情是建立于对上海风情的想象，爱与不爱或许已经不是在这段恋情中应该在意的的问题。老克腊接近王琦瑶并不是欣赏她存留的几分姿色，而是她身上充满旧上海的味道。因此，当老克腊面对承诺与担当的现实时，他选择逃避，就连在王琦瑶身上投下的一丁点情份都带走，头也不回地离开。即使王琦瑶苦苦哀求，老克腊也不为所动。老克腊始终是“怀旧”的新上海人，对他而言，王琦瑶是一种新鲜感，但这份新鲜感永远抵不过责任的捆绑。当王琦瑶想在他身上索取更多的需求时，在没有“爱”的辅助下，新鲜感只会褪去，剩下的只是喘不过气的现实。王琦瑶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恋情里，依然是被动者。虽然王琦瑶的一生中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与恩怨情仇的历练，但她躲不过命运的摧残，她本该是坚硬不摧的石头，到头来却牺牲在一个荒诞的谣言中。

王安忆在上海不断寻找自己，而王琦瑶也是如此，她将自己的亲生经历放在王琦瑶的成长经历中。王琦瑶不愿生活在小圈子里，而奋力挤进都市这个大世界。然而，王琦瑶们都只是这个小世界里的底层人物，突入大都市的她们只能卑微且坚强地生存，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王琦瑶的目标很明确，她要靠李主任过上理想的富足生活，所以她只能在男权和物欲中随波逐流，不得反抗。在康明逊身上，王琦瑶也带着一定的目的，她要他身上的爱，所以在面对康明逊的无能时，她也从不吱声。在社会进步的洪流中，都市女性往往只能依靠努力与坚强生存着，慢慢寻找自己在都市中的位子。王安忆笔下所塑造的王琦瑶不但具有性别魅力，她的软弱与坚强更能引发普通的都市女性的共情。²⁶

²⁶ 刘婧婧，〈新世纪女性都市小说略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五期，页144。

第二节 孤寂勇者：都市女性的独立奋斗之路

在都市的森林中，女性如同孤寂的勇者，踏上了一条独立奋斗的漫漫征途。这是一个时代的呼唤，一个崭新的篇章，描绘出都市女性在生存的舞台上，扮演着勇敢而独立的角色。在这个时代的拼搏中，女性的存在不再是辅助或附庸，而是展现出了与男性平等较量的勇气。她们穿梭于繁华的大街小巷，用坚韧的意志和智慧的眼光，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并非是一场孤军奋战，而是一种从内心升腾的独立精神，是对自我的挑战，对生活的掌控。孤寂，并非是弱者的标签，而是她们肩负的一种责任，是选择独立的代价。在城市的喧嚣中，她们学会了独自承受压力，学会了在孤独中寻找力量。每一位都市女性都是自己的勇者，她们用坚实的步履走向独立，用清晰的目标驱散孤寂。

王琦瑶表面上看似光彩照人，但她的内心却深受孤独和寂寞的折磨。尽管她身边围绕着许多异性，然而这并没有为她带来内心的安宁和幸福。她在上海这座城市不断寻找自己，然而命运却一直不善待她，抛弃和背叛的阴影时刻萦绕在她的生活中。除了在与李主任同居的短暂时光里，她几乎一直都在孤军奋战。她无奈地将李主任留下的金条视作她内心最后的心灵支持。这金条不仅代表了金钱上的支持，更是她的精神寄托，为她在困境中提供了一丝安慰。王琦瑶的故事是一个充满坎坷和挣扎的生命旅程，她在外表和内心之间承受着巨大的差距，而那坚如磐石的金条成了她唯一的心灵寄托。最不堪的是，这些金条不仅不能让她保持青春美丽，同时也挽留不了男人的心，甚至还惹来了杀身之祸。在小说中，王安忆以巧妙的手法将王琦瑶临终时的场景与她年少时在片厂目睹的情节相联系，这传达了一个深刻的信息，即王琦瑶面对命运时似乎无法改变宿命性的结局。与此同时，小说也反映出了个体身上那些难以消除的遗传因素对人生轨迹的深刻塑造。这呈现了人是无法与孤独抗战，最终还是落入黑暗的网罗里。

不仅是王琦瑶，蒋丽莉的也是都市社会下的一名孤勇者。身为都市女性的她是迷茫的，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经历让她不禁审视自己在社会的位子。蒋丽莉在原生家庭就失

去温暖，将她的情感寄托在程先生的身上，但无奈的是程先生的心思全在王琦瑶的身上，无论她怎么努力，她的心总是空的。后来，她与自己不爱的男人结婚生子，与自己的娘家彻底断绝了来往。她想透过自身的努力试图打破男女失衡的社会观念，为自己和女性寻找在社会中的自我价值。久而久之，她渐渐地雄性化，她性格变得暴躁，还会吸烟，与夫家和孩子不亲近，反而还嫌弃他们。她就这样过着孤身一人，孤立无助的生活，就如文章所提及：“一个人吃完饭，躺在床上看报纸，这边闹翻天也与她无关。”²⁷。都市女性在追求独立和平等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社会压力和困扰，使得她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感到孤独和无奈。

王安忆透过《长恨歌》揭示了都市女性在追求独立和平等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境和挑战。她们在孤独中寻找力量，但同时也因为社会观念、婚姻选择和人际关系的困扰而感到无奈。这是一场对于女性在都市生活中的无奈呐喊，对于社会观念和期望的反思。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中，女性的独立奋斗之路，尽管光辉璀璨，却也映照出着无法回避的沉痛。这是一个追求平等和自由的时代，但也是一个需要面对残酷现实的时代。王安忆在小说中放映出的孤独情感，都源自于她对社会、人性、自身经历的体验和深入洞察的结果，上海如何，王安忆的文章便如何。同时，王琦瑶的孤独就是王安忆的孤独，作者曾说：“我的经历、个性、素质，决定了写外部社会不可能是我的第一主题，我的第一主题肯定是表现自我。”²⁸，她将自身在上海所体验的孤独的情感放在小说的人物中心的情感思想中，就连用物质来满足生活与心灵的空虚都是一样的，但到后来换来的却是徒然的。无论是王安忆本身，还是王琦瑶，他们明显都不能透过物质来填补心灵的空隙。王琦瑶在文本中呈现出与众不同且鲜明的情感纠结，她的内心体验与个人心态在文本中清晰可见。她在人生中的每一场情感经历中所体验到的焦虑、无助和孤独情感，正是作家自身心态的生动放映，因他们同是上海的女儿。

²⁷ 王安忆，《长恨歌》，页 228。

²⁸ 沈红芳，《女性叙事的共性与个性——论王安忆、铁凝小说创作的契合与差异》，页 199。

第四章 《长恨歌》中都市女人悲催的命运

在《长恨歌》中，都市女人的悲催命运在文字之间得以生动而深刻地展现。王安忆以上海这个特殊而璀璨的大都市为叙述背景，通过主人公王琦瑶的命运叙述，揭示了都市女性在社会中所经历的无奈、挣扎与沉痛。在这个繁华背后，都市女人似乎总是被命运之手捉弄，她们在欲望和现实的较量中，常常成为社会变迁的牺牲品。王琦瑶，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身临上海这个光怪陆离、纷繁复杂的都市，承受了城市巨变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她的命运道尽了都市女人的悲欢离合，从一个弄堂的姑娘到上海繁华的社交场景，她的一生仿佛成为了都市风云变幻的缩影。都市女人的悲催命运在这个故事中成为一幅深邃而感人的画卷，勾勒出她们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所遭遇的重重困境和考验。同时，蒋丽莉的命运也是都市女人的缩影，女性的觉醒让她们不甘成为社会的边缘人，但他们的反抗是有局限的：“但她们的身心并未开发，真正的男女平等尚未实现，妇女的自我个体在整体解放斗争中被淹没了。”²⁹

第一节 找不到自己—成为欲望与权利的傀儡

在小说中，王琦瑶的形象如同上海一样，被赋予了神秘而矛盾的特质。上海，作为一个特殊的城市，既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又是欲望和权力的交汇之地，成为王琦瑶生命中的背景。这种背景不仅影响了她的个人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女性在都市化进程中所经历的种种考验。上海在小说中被描绘成一个光怪陆离、流光溢彩的大都市，仿佛是女性的投影。然而，这座城市的繁华背后隐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艰辛。王琦瑶努力追逐着这个城市的繁荣，但最终发现自己陷入了城市的无情漩涡。城市的表面璀璨和欲望的诱惑让女性在其中迷失，成为权力和欲望的傀儡，她们仿佛在明亮和黑暗的交汇处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²⁹ 王逢振，《女性主义》（台北：杨智文化，1995），页118。

王琦瑶是典型弄堂的女儿，是众多上海市民阶层的代表。王琦瑶们都有不切实际的梦想，她们渴望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是一种向往，也是一种虚荣，就如文中所写：“她们人在闺阁里坐，心却向了四面八方。”³⁰王琦瑶们身处在四十年代的上海这座大都市，城市的光不断一点一点渗透进弄堂里的暗，挑逗着王琦瑶们那虚荣的心。在虚荣心的促使下，王琦瑶自然不甘像其他上海女人一般在弄堂里结婚生子，度过平凡的一生。因此，当被李主任看上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李主任，甘当他的“金丝雀”。她原以为选择了大世界，殊不知这条路其实是崎岖坎坷的，她正一步步走向深渊。³¹王琦瑶是勇敢的，并不是所有女人会选择突破传统对女性的束缚，但她下的这步棋以功利为先，依靠男人来满足自身的欲望，便注定是一场死局。无论是“上海三小姐”还是李主任，都是王琦瑶前往富贵名望的一道桥，她努力地想要在上海这个繁华的都市里占有一席之地，但外在的富足远不能填补她内在的空虚和得到想要的自由。正如刘慧英所说：“她是背弃了几千年男权传统所赋予女性的角色——至少是不再按传统贤妻良母的人生形式限定自己，可是她们终究未能取得自由——传统女性以一个男人为其人生支撑”³²

除了权力的欲望，王琦瑶也困在了情欲中。王琦瑶的一生中都在男人的世界里游荡，她是清醒的，也是糊涂的。她清楚自己与富家子弟——康明逊不会有美好的结局，但她仍在她的繁华梦中不愿醒来，她的虚荣心让她坚持到最后，直到怀了孩子，康的不负责任让她心再此沉了下来。³³同时，因为她对权力和富贵的渴望，让她错过了一生钟情于她的男人。程先生可以说是王琦瑶生命里的贵人，每当王琦瑶有难时，李主任总是义无反顾地帮助她。或许王琦瑶不是对程先生无情，只是程先生和她一样都是小世界里的人物，唯有掌握大世界的李主任才能让她过上梦想的生活，所以她选择了李主任。她一次又一次的抓住命运的绳索，但她抓的不够坚定和彻底，最终反被命运倒抓一把，无法逃脱。这不是王琦瑶的错，也不是上海的错，是社会的变迁，使女性夹杂在传统与现代的两个维度里，不知道该什么审视自己与世界，只能随风漂流，按照

³⁰ 王安忆，《长恨歌》，页 28。

³¹ 钱智民，《风华绝代终难免百年长恨——王安忆《长恨歌》的悲剧意蕴》，页 13。

³²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5 年），页 189。

³³ 郭霄，《虚荣之后的孤独——由《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感情历程对其性格分析》，《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 年第 9 期，页 10。

自己的心意来突破女性命运，仿佛像是一场赌注，不清楚胜算如何，或赢或输像是在自己手里，但其实都在命运里。

在小说中，作者深入挖掘了上海的文化底蕴，通过弄堂、流言、鸽子等元素，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城市画卷。这些元素不仅是城市生活的写照，也是女性命运的象征。城市的虚无性在这些细节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而女性在城市中的漂泊和彷徨更使她们成为欲望和权力的囚徒。王琦瑶的悲剧在于她对城市繁华的追求与对个人欲望的坚持最终化为一场失落的旅程。她的聪明与敏感并非让她在这个城市找到自己的利器，反而成为她无法逃脱的困境。城市变迁的浪潮使她在时代巨变中失去了栖身之所，她的生命如同上海的去，转瞬即逝，而在旧上海的废墟上又生长出一个崭新的城市。总的来说，王安忆的《长恨歌》通过王琦瑶这个女性形象，以上海为背景，深刻而细腻地展现了女性如何在欲望与权力的漩涡中找不到自己，成为社会变革中的傀儡。小说通过对城市文化的描绘，突显了女性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呼唤着社会对女性地位的深刻思考和关注。

第二节 女性的无奈与不幸

在当代的都市迷宫中，女性的生活如同一场错综复杂的舞台剧，她们有时在职场的灯火下辉煌夺目，有时在家庭的幕后默默奉献。然而，在这个灿烂舞台的背后，都市女性的内心却往往被无奈与妥协所深深打上烙印。这是一个关涉职业与家庭、个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议题，而这种无奈与妥协，似乎已经成为都市女性生存的常态。在城市的高楼林立之间，女性们穿行于繁忙的职场中，她们在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努力，争取着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她们也面临着事业与家庭的双重艰难。职场的竞争让她们不得不在事业与家庭之间作出取舍。这种取舍，常常需要她们做出无奈的决定，或是牺牲家庭的陪伴，或是削减事业的发展。都市女性在这个取舍的岔路口上，往往感到无法逃避的无奈。

蒋丽莉在上海解放的时候，参加了革命。由于蒋丽莉有文化底蕴又上进，便提名当干部了，过后与纱厂的军代表结婚，生了三个小孩。对政治生活中的女性尊严的追

求，让蒋丽莉忽略家庭及自身的需要。她和丈夫不亲密，她嫌弃丈夫的粗鲁莽撞和身上难闻的气味，而孩子是丈夫的缩版，对他们自然也讨厌，孩子也不喜欢她。在家中，蒋丽莉似乎是一个陌生人，总是独来独往。在她选择在社会上拼搏时，她失去的就是与家庭的相处时光，她没有办法花更多的心力来与家人相处，以至于她无法发现生活上丈夫与孩子细腻的一面，她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厌恶。直到她病倒，丈夫老张背她倒医院看病时，那时她依附在丈夫的后颈窝里，静静地感受丈夫身上的温暖：“蒋丽莉伏在老张的背上，嗅到他很浓烈的脑油气味，心里涌起一股软弱的温情。”³⁴ 她终究是一个女人，她也有软弱的一面，是社会让她无奈地站了起来，让她在独立自主中缺乏女人应有的温暖。

都市女性与弄堂里的女人不同，她们看到的是更全面的女性艰辛，而弄堂里的女人相对来说简单得多，围绕她们的是日常的精打细算和流言蜚语。当然怀揣梦想的弄堂女人还是很多的，像王琦瑶就是其中之一，她不仅对富裕的生活有憧憬，同时还带有不甘，所以她选择突破原有的生活。从社会层面来看，当女性获得经济独立就是她们获得社会认可的条件之一。因此，当她们没有经济基础来维持生活时，她们就会越发对金钱与物质有渴望，甚至用尽一切手段来得到，即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在所不惜。当王琦瑶真正接触城市的绚丽时，她更加不愿意放手，所以她不会让李主任这个圆梦使者离开。这样的王琦瑶是可笑的，同时也是值得同情的。

在都市的喧嚣中，女性似乎总是成为欲望和权力交汇处的弱者。她们在现代社会的洪流中，面对家庭的期望、社会的压力以及自身的梦想，往往承受着沉重的心理负担。《长恨歌》以王琦瑶的命运为例，揭示了女性在传统价值观和现代风潮的碰撞下，如何在家庭、爱情和事业的三角纠葛中迷失自我。她们似乎总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陷入囹圄，成为权谋和欲望的牺牲品。此外，都市女人的悲催命运也体现在她们对社会变迁的无奈。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中，女性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的一部分，她们在传统礼教和现代观念之间左右为难。在小说中，王琦瑶和蒋丽莉的一生如同都市风云的缩影，她们的经历代表了那个时代许多女性的心路历程。都市女人在现代化

³⁴ 王安忆，《长恨歌》，页 265。

进程中，常常为了适应社会的变迁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她们的命运如同沧海一般变幻莫测。综合而言，《长恨歌》通过对女性们命运的生动描绘，彰显了都市女人悲催的命运。这部小说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勾勒出女性在都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心灵困惑和命运考验。都市女人的悲欢离合，既是个体命运的写照，也是社会风尚的映照，呼唤着对女性地位 and 价值的深刻思考。

第五章 结语

王安忆透过自身的身处环境与经历，创作了《长恨歌》以上海这个大都市为生活背景的长篇小说。她通过讲述主人公在现代都市中的成长经历，揭示了都市女性在社会变革中所面临的悲剧和困境。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通过对王琦瑶、蒋丽莉等女性形象的刻画，深刻地反映了都市女性在追求独立、平等、幸福的过程中所受到的社会压力、家庭困扰以及情感纠葛。这些女性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都市女性的内心挣扎和对于生活的无奈。

在这篇论文中，本人深入分析了王安忆通过小说《长恨歌》所传达的都市女性悲剧。本人关注了王琦瑶和蒋丽莉这两位女性角色，探讨了她们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面对的问题。王琦瑶的孤独与寂寞，以及她在感情上的挣扎，呈现了都市女性在追求幸福时所面对的复杂局面。蒋丽莉则通过她的家庭经历和对于社会观念的反抗，展现了都市女性为寻找自我价值而不断努力的一面。

透过研究《长恨歌》，让人们不禁要对这部小说所揭示的都市女性悲剧进行深刻的反思。首先，都市女性的独立奋斗之路充满坎坷，她们在事业和家庭之间难以平衡，往往为了追求自我而付出了个人生活的代价。这种生活状态不仅在心理上带来孤独感，也在社会观念和家庭关系中带来了矛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不同程度上都反映了这一困境，使读者对都市女性的生活状态产生深刻的同情。

其次，小说通过王琦瑶和蒋丽莉的故事，揭示了现代社会对于女性的期望和限制。尽管社会在不断进步，但在某些方面，依旧存在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传统观念。女性在事业和婚姻中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压力。这让我们对于社会性别观念和女性权益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并尊重女性的选择权和平等权利。最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呈现了一种现代文学对于女性主义的思考。通过对女性角色的深刻描绘，小说在文学层面上表达了对女性独立、自由的追求。

这也引发了我们对于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关注，思考文学作为表达社会现象和情感的工
具，如何反映和引导社会对于女性的关切和理解。

综合来看，王安忆的《长恨歌》通过都市女性的悲剧展现了社会发展背后的一些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地位和困境的关注。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种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和呼吁。通过对这些都市女性形象的关注，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关爱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和包容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专书

1. 【法】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 黄淑祺，《王安忆的小说及其叙事美学》，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5。
3.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5。
4. 沈红芳，《女性叙事的共性与个性——王安忆、铁凝小说创作比较谈》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5. 王先霏、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6. 王安忆，《长恨歌》（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
7. 王逢振，《女性主义》（台北：杨智文化，1995。

期刊论文

1. 郭霄，〈虚荣之后的孤独——由《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感情历程对其性格分析〉，《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9期，页8-10。
2. 李海燕，〈城市与女人——王安忆都市书写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4卷第一期，页81-84。
3. 李湘云〈都市叙述空间与人物生存的书写——张爱玲《倾城之恋》和王安忆《长恨歌》比较〉，《文学评论》2023年第9期，页106-108。
4. 刘芳池、何丽敏，〈对男权社会的无奈认同——王安忆《长恨歌》中男性形象解读〉，《时代文学(上)》2010年第三期，页118-120。
5. 刘福珍、蔡勤，〈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悲剧成因〉，《安徽文学(下半月)》2007年第1期，页14-16。
6. 刘婧婧，〈新世纪女性都市小说略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五期，页137-145。
7. 刘士林，〈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学术研究》2007年第10期，页120-125。

8. 钱智民,〈风华绝代终难免百年长恨——王安忆《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五期,页11-14。
9. 王春翔,〈浅析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的悲剧根源〉,《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12期,页14-15。
10. 许成颖,〈独特的女性都市文化体验〉,《宁德师专学报》2004年第三期,页44-49。
11. 许梦娇,〈《长恨歌》:一个女人和一座城〉,《大众文艺》2023年第三期,页23-25。
12. 杨明月、郑瀚,〈秋色玉目皆婉转,只待人间齐眉歌——浅析王安忆《长恨歌》中女性的悲剧命运的原因〉,《名作欣赏》2020年第十八期,页93-94。

学位论文

1. 洪建妮,《论王安忆〈长恨歌〉的都市书写》,青岛:青岛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2. 赵欣,《上海都市文化与上海女作家写作》,上海: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网络资料

1. 〈王安忆生平年表〉,《中国作家网》2016年7月4日,《中国作家网》,〈王安忆生平年表〉。<http://www.chinawriter.com.cn/fwzj/writer/56.shtml>